卷一：张学良自述

引言

1984年“ 九·一八事变”那一天，在台湾一张有影响的报纸——《 联合报》第6版上，发表了该报资深记者于衡撰写的专访，题为《 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张学良访问记》。

这是张氏被蒋介石幽禁40多年来，在台湾首次有新闻记者近距离采访这位“ 西安事变”的当事人，所以当时格外引人注目。不久有人把于衡这篇文章转介到国内，其中让人耳目一新的是，该文提到张学良在禁幽期间曾产生写《 回忆录》的欲念。据于衡说，张学良甚至还对台湾记者表示：他在研究《 圣经》之前，曾经萌发写回忆录的动念，而且又拟好了《 回忆录》的题纲。张氏又说：“ 我写《 回忆录》的原则是：第一写自己经手办的；第二写自己亲眼看见的；第三写自己亲耳听见的。但在研究《 圣经》以后，一切都不想写了。”

现在看来，当时让国内读者笃信不疑的上述新闻，原来竟是子虚乌有。历史的真实是：早在《 联合报》记者于衡在台北荣民总医院病房里分多次采访张学良之前，张氏本人早已经动笔写了一篇《 回忆录》，只是这篇《 回忆录》在当时的政治条件之下写出之后即藏于密室，外界始终无人知晓。一直到《 回忆录》的主人在檀香山溘然仙逝前不久，才被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历史小组成员在台北的张氏朴园里意外发现。不过即便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张学良自己仍然不准备解除尘封，公开面世。这就是下面收录的《 杂忆随感漫录》！

张学良是在什么情势下决定写这篇《 回忆录》的？

对外多年密而不示的《 杂忆随感漫录》，始于1957年早春。张学良系于当年1月4日动笔，一直写到4月20日稿竣。前后共计用了近四个月的时间。当然，由于身体的原因，张学良在此期间写写停停，边思边写，如烟的往事，需要花甲老人一点点、一棕棕的梳理追忆。终在五月到来之前，写完了这部必须要上交国民党最高当局及蒋介石本人批阅的手稿，《 回忆录》长达四万余字。在整整一个早春时光里，张学良平均每个月要写一万多字，如将此事放在一般经常从事文字写作的人身上，也许不值称道；然而这对于戍马一生、指挥千军万的张学良而言，无疑是万难之事。用他自己的话说，这就是“ 打鸭子上架”，勉为其难了。

既然张学良从来没有写文章的习惯，更没有亲自动笔完成洋洋数万言文字的先例，既然如烟往事不堪回首，在他本撰写《 回忆录》的整个过

程中，又曾因缅思故人几次泪水湿透了枕头。那么，他究竟为什么要在国民党特工人员层层警戒的新竹清泉山中，面对一盏幽幽煤油灯，挥笔写下这些让人读后震惊的文字呢？

事情似可追溯到两年前——1954年秋天。

张学良久囚思动，尤其是他羁押台湾将近十周年的时候，年近六旬的他自知老境将临，甚至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希冀东山再起。因此有一天，当他发现身边负责管束自己的特务队长刘乙光少将即将奉命离开群山环抱的清泉幽禁地，前往台北郊区阳明山参加国民党将官以上军人集训班的时候，张学良也忽然在心中突发奇想。他要求刘乙光把自己也想前往阳明山参加军官训练班的意念，顺便转达给蒋介石和宋美龄伉俪。他认为自己已经失去自由二十多年了，即便按1936年南京军事法庭判罪的刑期10年，他也早早超过了。所以张学良只要有机会，就千方百计请求出山，这次他又作了最后的挣扎。

现从张学良大量解密的书信和《日记》中不难发现，张学良早在1936年失去自由时起，即从1937年始不断在湖南、贵州等地给蒋介石、宋美龄呈递信件，请求给他以出来工作的机会。尤其是“七七事变”发生后，张学良渴望请缨上阵、参加抗战的愿望就变得越加强烈。只要有客人到他的幽禁地探访，张学良无不利用机会给蒋介石写信求助，甚至表示他不计军阶地位，也要为国家奉献一腔热血的真实情感。然而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张学良的上述种种愿望多以失败告终。特别是张学良来到台以后，他给蒋介石写信的机会更多，几乎每次都提及请求出来“做事”。正由于张学良始终不甘沉沦，东山再起之志不泯，所以1954年10月当他再次利用特务队长刘乙光前往台北集训之便，请求出山的时候，因年龄的关系，张学良决定不惜一切代价也要作一奋争。因此他不但请刘乙光代话国民党最高当局，而且他还亲自给蒋介石、宋美龄各写一信，强烈要求参加阳明山的国民党高级将集训班。

张学良原本以为这一次请求，还会像以往曾经有过的先例一样，渴望自由的美好愿望再次化作流水。出乎张学良意外的是，经常阴着脸的蒋介石在收到他的信后，居然对张学良露出一丝少见的微笑。蒋介石不但亲自召见了特务刘乙光，当面询问张学良在清泉监禁的表现，而且蒋还当场对刘乙光点头笑说“好好好”，表示同意张学良参加阳明山的集训。刘乙光因有张学良之托，于是借机向蒋追询何时才能让张学良出来接受集训。不料一旦接触敏感的实质，蒋介石又沉吟再三，以托词加以婉拒了。

据张学良《日记》记载，刘乙光转达的蒋介石之语意，显而易见表现出蒋对张学良出山所流露出的忧虑和不安。蒋介石当时的托词是：第一，如果现在就让幽禁多年的张学良到阳明山去受训，国民党高层人士一定会引起意外的震动，有些反对张学良的国民党将领肯定不会对张氏当年在西安的行动表示谅解；第二，万一因为张学良的“出山”引起波动，甚至

酿成一场政治风波，后果将要不堪设想。

鉴于此，蒋介石不得不采取虚与委蛇的手法，稳定张学良冲动的情绪。他认为如果让张学良恢复自由，惟一可行的作法只能是“ 须先有步骤。”而这个步骤的具体内容是：蒋介石要求张学良先写一本书。把张学良自己的家庭渊源、人生经历、以及当年的抗日情结、对共产党的观感等等，一律写成文字，也就是一部通常所说的《 回忆录》。然后把这《 回忆录》在台湾公开发表，借以“ 变幻外间观感。”在蒋介石看来，张学良只有这样做，将来才可能在适当时机出来工作。

张学良渴望出山，渴望自由，已非一日之念。然而自由的代价对他而言实在太高昂了。此前他已经付出二十多年幽禁的代价。而今蒋介石又交给他写《 回忆录》的任务，一个从前只会指挥军队南征北战的少帅，一个从前连写字也要靠秘书代劳的国民党陆军一级上将，为了自由，就不得不屈从于蒋氏的压力。于是，他经过长时间的思考酝酿，终于决定执笔完成蒋介石交办的任务。张学良要把自己的经历与思想变化写成一本书。

让张学良始料不及的是，这耗去他四个多月苦心孤诣撰写的《 杂忆随感漫录》，并没像后来他另尊蒋介石之命所写的《 西安事变回忆录》那样，在写成几年后就得以曝光。就连张学良自己也不清楚是什么原因，这部史实十分详尽、对自身思想变化剖析至深的《 杂忆随感漫录》，由刘乙光呈交蒋介石后，竟然从此石沉大海。个中原因不得而知，不言而谕的理由是，在很大程度上仍是蒋介石内心深处永远不肯释怀的“ 西安事变”作祟！

现在侥幸得以存世并终于面世的《 杂忆随感漫录》，原是张学良这部《 回忆录》的手稿（ 当年呈交蒋介石的稿件为赵一荻所抄）。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当张之宇、张之丙姐妹并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历史小组来到台北朴园（ 张学良的北投复兴岗70号寓所。因庭院里生有若干枝桠茂繁的朴树而命名朴园），与张学良就他的人生经历进行漫谈式采访。张氏姐妹后来在为张学良整理状如积山的书籍文稿时，才意外发现有这一部珍贵的《 杂忆随感漫录》尘封在浩繁的文稿书籍中！

尽管早已年深日久，张学良从前在清泉群山深处一笔笔撰写的文稿，早已经尽沧桑，纸页泛黄。但在张氏姐妹眼里，它毕竟是难得的笔录文稿。然而，出于张之宇和张之丙姐妹意外的是。当她们提出要把这部手稿相机整理面世之时，张学良居然主张一火焚之。幸好有张之宇的据理力争，百般说明保存这些文稿的必要性和历史价值，张学良才半推半就地点头应允。

不过，在张学良的有生之年，这位曾对这部《 杂忆随感漫录》抱有极大希冀的作者，决然不想有一天把这部手稿拨云面世。张之宇女士的历史功迹在于，她不但把张学良这部《 随感漫录》保存下来，而且又在张学良作古之后，经她的苦心整理而终得面世。

由于张学良的《杂忆随感漫录》在写作时所处的特殊环境，亦由于这是张学良为换取人身自由时蒋介石交办的一项任务，所以这部《回忆录》显然是在国民党特工枪刺之下完成的稿件。当这部手稿经历半个多世纪的风雨之后，现在再来翻阅，不免在鉴定史实之余，又难免心生惊诧与唏嘘。看得出来，当年诸多与台湾当局政情格格不入的理念观点，显然有悖于传主行文的初衷。例如对“西安事变”等许多在当时敏感的政治话题，张学良出于为重获自由与东山再起目的，在此前之下他不得不作些必要的委曲求全。对于这些不能真正代表张学良思想心路的篇章段落，编著者为适合国内读者阅读的需要，进行一些必要的删节。尤其对《杂忆随想漫录》的最后一章，由于不适合中国的国情，因此作了整体删除。我想这样处理不仅对维护张学良在国内读者心中固有的形象有益，同时对热爱崇敬这位“西安事变”发起人的读者也是一种补益。张学良《杂忆随想漫录》涉及的民国政治人物甚多，为读者阅读的方便，笔者无法面面俱道，只对其中与张学良关系较为密切的人物，择要进行注释。同时，又对张学良在《杂忆随感漫录》中的错字作了订正，至于语法中的习惯用字，如“的”和“地”字时常发生混肴等情，为尊重张氏遗稿原作之真实性，基本上都保持了原貌，照引照录，意在让今天读者尽可能地读阅张学良之原文。

窦应泰

2005年2月于北京通州

《 杂忆随感漫录》

张学良
（ 一九五七年四月）

前言

我在这十几年来，甚喜浏览历史，而深感中国史书，不只是古代史，就如最近之现代史，疑云重重，记载上多有不真实之处。然此并非皆由于写史者有意歪曲，而真实之史料，实在是难得访求也。有之传闻失真，有之记述讳隐，有之自我夸张，或者泯灭无可察考。此之对于后世之人，诚为重大之遗憾。我今山居幽闲，不揣冒昧，拟将亲自所经历，有关可供为历史的资料，真实记述，以供史学家之参考，或者有戒于后人。

自度已近花甲之年，岁月无多，兹先就数宗关于我自身的，目下我能想起来的认为是比较重大者，分别写下。我虽尽力排除主观，然以我自己写自己之事，必然是有我自己的观点和我自己的言论在内，尤其是目下我自己的心情。我力求避免上述不实、讳隐、夸张之弊，而存其真。我半生戍马，又不曾致力于诗文，今日伏案写著，此诚东施效颦，文笔拙陋，词不达意，势在必然。再有现时我缺乏参照询咨，但凭个人记忆，年月日期，姓氏名号，无法写得清确，只得如此，以备补正。此记述之目的，旨在供（ 应为贡字之误——引者注）献真实材料，所以不顾瑕疵。务请大雅谅之。假如有更好历史的同道，加以纠正补充，实所至望。

四十六年元旦于清泉

我的父亲和我的家世

我的家世

我们原是河北人逃荒到辽宁的

我的家世，既非望族，亦非伐阅。我们的老家原是河北省大城县，在前清初年，因遭逢荒年，流迁到辽宁省海城县的家掌寺地方。世为贫苦农民，除耕种之外，以烧碱为生，仅能糊口。

（编著者按语）民国史中较为权威的史学家金毓黻，生前曾经撰写《张作霖别传》传世，多年来一直是国内史家研究张作霖传略的可参之书。然而金氏的《别传》与张学良的《自述》也有误差。譬如张作霖的出生地，多年以来大多延用金氏之说法——直隶（河北）高阳东徙。而张学良本人的说法则是河北省大城县。除此之外，已经见诸史料的相关记载之中，对于张学良先祖从河北下关东以后的生计，亦以金氏的著述为准，均以“设小商肆”加以记载。也就是说，多数史家的记载表明，张氏家族从河北迁至辽宁驾掌寺（而非张学良所称之家掌寺）镇落脚后，曾经以经商为业。现在张学良本人则称自己的祖辈来到东北初期竟是在耕种之外以“烧碱”为生计。金毓黻并非空头史学家，民国初年他即出任奉天省政府秘书长兼教育厅长等要职，出入张氏帅府已是寻常之事，张学良执政东三省时期，金毓黻与张学良的交往接触更多。称得上是有“实际生活体验”的民国史专家，尽管如此，出于金氏笔下的史料竟也偶有谬误，更遑论那些以讹传讹记载的失真之处了。

我们本来是姓李

我的祖宗，原为李姓，大概是在家的高曾祖时代，张、李两家原本是亲戚，又同为是由大城逃荒而来者，张家无子绝后，领养李姓之子以继香烟。遂冒姓了张氏。

（编著者按语）东北史中关于张学良原本李姓一说，虽然早有人提及。但是说法却与张学良《自述》迥然不同。张学良自解为张姓之起因系“张家无后，领养李姓之子以继香烟。”而东北相关史料记载的李姓更为张姓的原因竟南辕北辙。东北流传的野史更是五花八门，其中一种压倒多数的说法，则认为张家之所以李姓改张，全是因为“李家的姑奶奶嫁后未育，过给李家为嗣，故改姓张。”

我的祖父之死

我的祖父为人慷慨尚侠义，对于乡里凡有不平之事，虽不干己，亦多挺身而出，到后来也就是为了替人家打抱不平而死。

缘因：有王姓者，恃强凌弱，我祖父出而论理干涉，王某怀恨在心。某晚路遇我祖父于野外途中，要挟向彼陪罪，我祖父本已衰老之年，王某乃年轻力壮者，我祖父怒骂不己，被其殴伤，仍迫赔罪，我祖父始终不允，遂致重伤而死。

彼时我家贫苦，王乃地方富户，当时的官府，如俗所云：“衙门口向南开，有理没钱少进来。”我家糊口都成问题，那里敢同一个富户去打官司哪！

（编著者按语）关于张学良祖父张有财之死，笔者在上世纪70年代，为撰写《张学良家族》，曾去辽南张氏故里一带进行走访调查。张有财的死因，可供参阅的史料记载有限，而民间却有种种说法，显与张学良《自述》中提及的情况不尽相同。但是张有财死于非命，众口确是如出一辙。

笔者在拙作《张学良家族》中对张学良祖父张有财之死曾作如下记述：“清光绪十五年（1889年已丑）初夏，张有财自春节过后便没给家里捎钱分文。在外亦无任何音讯。王氏（张学良祖母）在驾掌寺家中因为女儿秀英生病，无钱医治。就托乡里屯邻给张有财捎信，希望他能给些钱钞了解燃眉之急。可是乡邻到了镇上张有财设局之处，并没有找到他的影

子。有人称数日前张有财已经回家，也有人说张有财去驾掌寺东村讨赌资未归。王氏得知这一消息，心生疑窦。因张有财从没无不在赌局而归家的时候。于是，王氏就命三个儿子作泰、作孚和作霖四处寻找乃父张有财的下落。然而，弟兄三人寻遍所有张有财的可去之处，竟然音迹杳然。

王氏找不到张有财踪影，误以为必定又隐身其它赌场。故而也并不十分在意，女儿的病只好依靠自已为他人作针线活换得的钱钞医治。

一直拖至旧历5月13日，张有财仍无下落。一天，王氏正在家里心里焦虑烦躁，忽听家养的一只大黄狗在院里发出凄厉吼叫。王氏不知何故，出门看时，见大黄狗刚从外边回来，冲她十分反常地狂吠不止。王氏越加诧异，见大黄狗用嘴咬住王氏的裤子，拼命向院门边拉扯。王氏便随黄狗来到距家一里远的树林，忽见黄狗没命一般冲进柳树林子。王氏尾随而来，见大黄狗沿树林边小道来到一片水塘。几只在水边啄食的乌鸦“ 呼拉 ”一声从地上飞起。水塘边竟有一具早已腐败发臭的尸体！大黄狗猛然扑了上去，没命地冲那具被乌鸦叼啄的尸体狂吠起来。

王氏扑上看时，正是多日失踪的丈夫张有财！他身负多处伤痕，头面鲜血淋漓，惨不忍睹。王氏虽不时憎恨丈夫赌博成瘾，然终究夫妻一场，没有想到他居然因赌博遭害，死于非命的丈夫凄惨而亡。王氏扑地大哭，所有围观者无不黯然下泪。

从现场所见，张有财是在毫无防备情况下，遭到恶人的突袭惨死。张有财的猝死在当地引起轰动。时值夏天，人命关天。乡内里长栾凤泰见有财死因不明，急忙命人将现场封锁，又唯尸体腐烂，将食盐洒于尸上。然后派人进海城报官。海城县衙派来仵作验尸。“ 只见身前无伤，惟脑后被刃物打破致死。 ”县衙认定张有财死因后，即下令通缉凶手，捕拿人犯。

嗣后经县衙调查得知张有财死因，竟也与赌博有关。原来，张有财在赌局上与一李姓惯赌相熟。此人一惯刁顽不羁，心性凶恶。虽然连连在赌场上身处败局，又不肯服输。一日，李氏赌棍再次赌输，张有财只好向他索要连日所欠赌资。李氏赌棍无策，只好伪称可去其家取钱。张有财不知有诈，在一个月色昏黑的夜晚，与李氏向距张家约三里的李家屯走去。当两人行至一片柳树林时，李氏忽然跪地向张有财求饶：“ 家中无有隔夜之粮，只有妻子一人，无法偿还赌博之债，请宽容几日才好！ ”

张有财素以赌资为生，见李氏在赌局上气势汹汹，如今到无人处又虚与委蛇，谎称无力还债，岂肯相容？张有财揪住李氏不依，李氏早在心里怀恨张有财催债太黑。两人在塘边争吵不休，新仇旧恶，涌上心头。又是李氏走投无路之时，现出无赖面孔，张有财也得理不肯让人。穷凶极恶的李氏恨从心中起，恶向胆边生。谎称斗他不过，情愿回家去取赌债，张有财不知是计，转身便向前追去。李氏顺手从河边拣起一块拳头大卵石，突然双手举起，狠命向张有财后脑重重砸去。张有财当即扑倒河边，呜呼哀哉！

官府张榜通缉李犯。李犯自行凶后自知该当死罪，连夜潜逃深山老林里隐藏起来。初时海城官府还虚张声势到处张榜缉拿，后见张有财遗族均是孤儿寡妇，便不了了之。直至多年后，此犯也没归案。王氏带着作泰、作孚、作霖三个儿子与前房的遗女秀英，一家五口，从此再无生计。

张有财死后情况异常凄惨，据与张氏家族渊源甚深的周大文（张学良秘书、曾任北平市长）追述：“张有财死后，乡里集资买一薄板棺材，厝埋在别家地头上。是年秋间雨大发水，将棺材冲走，后在附近荒郊发现此薄板棺材。系被一小土岗搁浅，棺材前还有几棵高梁挡住。以前棺材埋的所在，并非自已之地，又兼无力搬运。且此处地亦无主，于是便就埋在该处。至今仍末迁移。……”

现在张学良在《自述》中记述的祖父张有财之死，虽与笔者及周大文等记述的大体相仿，但在细节上各有不同。至于张家的仇人是王姓而非李姓，当然应以张学良的《杂忆随感漫录》为准。

我的父亲

我的父亲弟兄二人谋复不共戴天之仇

我父亲雨亭公，讳作霖，同胞弟兄三人，我的大伯父早死。二伯父同我父亲决心誓报我祖父之仇。

于某一夤夜，兄弟二人，持一土枪，潜入王姓宅院，不幸被同住的佃户老太婆发觉，出而强行阻拦，我父亲不慎，黑夜之间误将老太婆击毙。报仇未果反误伤他人，我伯父被捕，我父亲逃去，王姓遂控告我伯父等抢劫杀人。

我伯父声辩，为谋复父仇，并非抢劫。虽抢劫杀人之罪得直，但仍被判为误杀之助手，有罪入狱。我二伯父作孚公，在前清末年为地方保卫团团董，追剿土匪阵亡，得阴为世袭云骑尉。

（编著者按语）关于张学良的二位伯父，历史资料记载有限。张学良的《自述》中也涉及不多，现补充如下：张作泰为张学良没有见过面的大伯父。清同治十二年（1873年）冬，张作泰出生在辽宁海城叶家铺村。乳名小七，字雨阁。八岁时得号作泰。性温和，重友情。在张氏三弟兄中是唯一有文才的人。他少年即善诵诗文，喜读古书。偶有诗文传于世间。

其中《 秋恨》一诗，就颇有那个时代的特色：

人逢乱世万事哀，
誓把情仇付东海。
今生纵难酬壮志，
遗恨空留天地间！

其父猝遭横祸殁后，张作泰和张作孚即随母前去黑山县二道沟当雇工。初时兄弟二人给二道沟的郑财主家扛长活。作泰放牛，作孚在郑家做另活。三弟张作霖那时虽然年龄还小，但也过早承担起养家糊口的重担。初时张作霖为本村财主赵钻子家放猪。次年张作泰染患痨病（肺病），这在当时乃无药治愈的绝症。同治十七年张作泰病死的前一年，在放牛时大口将血吐在草地上。终于有一天，张作泰再也挺不住了，连连吐血之后，扑倒在牛群里的草地上。从此再也没有爬起来。延至同治十八年冬，张作泰终因肺痨之疾不治，郁郁而死。时年仅十九岁。

张学良的二伯父张作孚，字雨台。兄长张作孚死后，他挑起了全家的生活重担，在田庄台地主鲍家扛活，后到大高坎杜家店当长工。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张作孚到清兵毅军里当上了军兽医，后来又为报杀父之仇而入狱，两年后张作霖将其救出。

1902年9月，张作霖在台安县八角台被朝庭招抚，升任新民府游击马队管带。此时张作孚始任新民府巡防队长。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当地官军马队和“ 保安队 ”纷纷投降日人，另一批人则成为俄国侵略军的“ 义勇队 ”。性情耿直的张作孚既不降日，也不投靠俄国军队，一怒之下，乃辞掉新民县府的本兼各职。毅然返回大高坎镇，决心赋闲乡里，习练诗书。母亲王氏那时尚未故去，她要张作孚马上在乡下结婚成家。张作孚听从慈母之命，很快结婚娶妻，不久张作孚生二子三女。即长子张学成，次子张学文。三女亦相继长大。张作孚早已淡忘官场，憎恨腐败，一心向往乡居，不喜欢与那些贪官污吏为伍。

1908（光绪三十四年）年日俄战争结束，张作孚在三弟张作霖的多次恳请下再次出山。是年旧历5月，张作孚被徐世昌任为黑山县警察队队长一职，多次前往黑山、北镇一带剿杀胡匪。此时正值黑山胡匪猖獗之际。张作孚既负剿匪重责，就决心身先士卒，不辜使命。张作孚经常统领麾下军警出没在乡村田畴之间，剿匪勇猛无敌，几次身上挂花负伤。号称辽南巨匪的杜立山等匪股，就是被张作孚和张作霖统领的前路巡防共同剿杀的。因而朝廷向张作孚赏赐穿黄马褂的殊荣。

1910年冬，黑山大雪纷飞，张作孚率黑山警察队在距县城十里的吴家窝堡冰河上，与杨花子匪股在冰天雪地里遭遇。张作孚的警察队仅十余人，而杨花子匪股则有七十人之众。且又都是马匹火枪，多数惯匪均有百步穿杨之功。张作孚与胡匪遭遇时就处于劣势，但其毫不气馁，在敌众他寡的情势下，坚持向疯狂而来的胡匪开火。忽然一颗飞来流弹将张作孚击

中，致其当场阵亡。

张作孚死后，遗有妻子儿女数人。1916年张作霖夺取东三省军政大权以后，遂将张作孚所遗几个未成年儿女接到奉天大南门帅府西挎院里抚养，张作霖死后，由张学良继续抚养，直到把张作孚的遗孤抚养成人。

避祸投军

我父亲既定为误杀之正犯，因而逃走，投入毅军宋庆部下。曾参甲午之役，后积功得升为哨长。数年后辞差回里，自以为衣锦荣归。殊不知到家之后，王姓知晓，惧我父再来报仇，投官府报案，请求逮捕我父亲，幸乡里得知，通告速为躲避，不得已再事逃亡。我父亲曾习过兽医，以医马为糊口，因之结交了好些江湖朋友。时逢庚子之乱，我父亲同几位好友，并营保险生涯。

后来有一伙豪强，由一名为海沙子者率领过境，向八角台征索粮饷，如交不出，即行攻打。我父亲向海交涉说：“ 我在此地，受父老之托，受人家的供养，保卫此地，你的勒索，我决不应允，如相攻打，必致糜乱地方，于心何忍。”

相约二人单独决斗，在郊外同时以枪互相射击，如我死你则领我之众，领受此地之供养，如你死则你众归我率领。何必攻打，使无辜人民受苦，使部属受灾难乎？海则同意，二人在八角台郊外互相对击，我父亲虽受微伤，海沙子死焉，我父亲遂收其众。

（ 编著者按语）上面一节，张学良有意回避了乃父张作霖曾经啸聚绿林、落寇为匪的经历。翻遍所有民国史，关于张作霖历史的记述，几乎都没有回避张作霖曾经当过绿林胡匪的经历，仍依金毓 所撰《 张和霖别传》为例，他关于张作霖投身绿林的经历是这样记述的：“ 作霖十四丧父，窘于生计，随母至小黑山，依外家以居。清光绪甲午中日战启，投毅军统领宋庆麾下为戈什哈。……久之，有庚子八国联军之役，东三省陷于俄军，各地抢攘不安，诸桀傲不训之徒，纷纷啸聚。绿林子弟假团练之名，自划地区，征取租税谓之保险费，作霖其一人也。”

这是民国史料中较为最早的一篇关于张作霖为匪的记述。《 张作霖别传》出版时，张作霖本人尚未作古。他对于做过胡匪一事，也从没有表示过异议。另一本张作霖在世时出版的《 辽海小记》中，也提及张作霖在郭松龄倒戈时说的一段话：“ 我张雨亭当过胡子不假，可是我打过谁的家？绑过的谁的票？我当年可是为着保护老百姓的身家性命才迈进绿林的门槛。郭鬼子他凭什么要抓住我当胡子这件事不放？”由此可见，张作霖生前对此从不讳言。

至于建国后中外史学家对张作霖在晚清民国年间，投身绿林的经历更是众口一词。但在张学良的笔下，如今却成另一种说法。由此可见撰写千秋之史，无论何人笔下，均难免为尊者讳。即便像张学良这样秉笔直书，也难免顾及亲情，扬长而避短也。

编为巡防营管带

迨拳匪乱平，我父亲部众，经官府收编，委我父亲为巡防营之管带，驻扎新民府。当时的知府为增韫，我父亲已经到了民国，对增从来礼敬之。后来蒙匪陶什陶（应为陶克陶胡——引者注），牙迁，猖狂肆虐，东三省及热河等四省会剿，皆未有功。我父亲被调至洮辽。加入剿匪。

（编著者按语）张学良对乃父这段人生经历的描述虽然十分简短，但这却是张作霖在北方崛起的关键时期，亦是张作霖为晚清朝庭建功立业的重要战役。张作霖与陶克陶胡在中俄边境地区旷日持久的鏖战，为绿林枭雄出身的张作霖日后进入民国政治舞台奠定了重要基础。陶克陶胡和牙迁，均为当时称雄北方的胡匪重要首领。陶克陶胡，1863年生于内蒙古哲里木盟的郭尔罗斯前旗，1904年沙皇俄国军队侵略我国东北后，陶克陶胡在前郭境内组成“胡红子”，出没在郭尔罗斯、达尔罕、扎萨克图一带，成为威胁满清朝庭的一股浩大匪患。虽经清庭多次派官兵进剿而其势愈烈。1906年起始陶克陶胡以索伦山为反抗清庭的基地，势与晚清朝庭为敌到底。1908年张作霖奉命从辽西前往洮辽地区（东北辽宁与吉林、内蒙交界处）对陶克陶胡匪股进剿，翌年大获全胜。将陶克陶胡逐于俄境。张作霖自此威震东北，成为北方一雄。

剿蒙匪有功升为统领

陶什陶被我父亲击散，逃至外蒙。将牙迁拿获献贡，以功升为巡防前路统领，我亦因此得阴了一个小小功名，我祖母得到诰封，在那个时代，可谓光耀已极。

迨至宣统末年，各省纷纷宣布独立，奉天驻军协统蓝天蔚，准备响应，拟举当时之东三省总督赵次帅为临时都督。

赵次帅之为人，持身廉正，忠贞不移，我父亲终身以师礼事之。能对我父亲加以约束教训，我所见者只此一人而已。赵死时我父亲在北京大元帅时代，亲为吊祭服丧，扶棺痛哭。

当时赵次帅，决不承允，拟死节。时值我父亲因事在省，赵召见告以明日咨询局将开会，拟举彼为都督，彼决心死节，托以后事。因为我父亲不但是赵之喜爱部将，曾拜为他之门生。我父亲力谏赵次帅请暂缓一时，明日咨询局之会，自身亦去出席，观看情势，如能挽回则不成问题，否则大家同死不晚。赵次帅嘉许之。

（编著者按）赵次帅，即时任东三省总督的赵尔巽。赵尔巽山东省蓬莱人，清道光22年出生，先世为汉军正蓝旗。清朝进士，其兄赵尔震和其弟赵尔丰均为清末封疆大吏。赵尔巽在东三省总督任上重用张作霖，将张扶上东北军政要位后，退居北京，民国后又成为北洋重臣。被张作霖始终引为知遇恩师。

辛亥革命发生时，蓝天蔚与当时的潜入奉天的革命党张榕等人一起组织力量，企图效法武昌起义，公推举赵尔巽为东三省都督，实则系以赵尔巽为革命党发动政变的挡箭牌。赵尔巽原本并不信任张作霖，但此时的张作霖却趁机救赵脱险，蓝天蔚等革命党人均被张作霖的武装力量血洗镇压。张作霖从而深得赵尔巽的信任，张、赵两人遂成莫逆之交，从此也开始了东北三省的张作霖时代。

只身斥退蓝天蔚

彼时我父亲之部属，只有三十几人，在省城讲武堂受训，部队皆驻防洮辽一带，距省城近者五、六百里，远者千里。遂请赵次帅，急调军队进省，令受训三十几人出堂，发给枪支。彼时蓝天蔚于省城北大营之军队则在一标以上。翌日在沈阳南门外咨询局开会，军队林立，气象森严。蓝天蔚当众宣布，东三省应当独立，拟推选赵尔巽为都督，征询有无意见。我父亲时在主席台上，坐于蓝天蔚之旁，突然立起，抽出手枪，力拍主席桌案，大声疾呼，我张某反对，请（问）何人敢再言此议者。会场则哑然无声，蓝天蔚悄然退出会场。我父亲急返入城，告赵次帅速令城门关闭，以防万一。赵次帅乃命我父亲为城防司令指挥警察以及赵之卫队，并急调辽北军队，星夜进省。我曾记得，曾为当时的老军官，告诉我说，他们曾日夜行军，多至一百余里！

四天的工夫，达到沈阳。而蓝天蔚亦未曾有何动作，蓝之内幕，我未闻之其详。我想当时参与蓝之事者，应该有个真实记载也。

我父亲后来扩编为陆军二十四镇，被任为统制，再改编为陆军二十七师师长。而后升任为盛武将军管理奉天军务事宜，再兼任奉天省长。

（编著者按）张学良在本文提及的蓝天蔚，字秀豪。湖北省黄陂县人

，早年留学日本，曾入东京士官学校。旅日期间与爱国将领蔡锷、黄兴等人相识并成密友，1910年回国后来到东北奉天，出任第二混成协统领。亦因思想激进和在日期间组成进步军人武装“ 拒俄义勇军 ”名噪一时，成为当时奉天省颇有名气的爱国军人。本文中张学良先生所说：“ 蓝天蔚当众宣布，东三省应当独立，拟推赵尔巽为都督 ”似与史实有悖。民国史与东北史记载的史实应为：蓝天蔚、张榕等革命党人欲借武昌起义的大势在奉天组建一个名曰“ 奉天国民保安会 ”的进步组织，以公推赵尔巽任会长的名义来达到逼其宣布“ 东北独立 ”之目的。当时蓝天蔚等人并非公推赵尔巽为都督，而是“ 会长 ”。因为辛亥革命之前，赵尔巽即为东三省总督。对此，张学良本人也承认：“ 蓝之内幕，我未闻其详。 ”

军队之扩充和奉军名称之由来

奉军之扩大及入关参预内战，始为“ 劫械 ”一役。彼时我只十几岁，正在读书时代，整个事情，我不知其详，仅就我所知道的来述写。

大概是北京政府因参战向日本购买了一批军火，步枪约三万只，炮和机枪若干，海运由秦皇岛进口，徐又铮携同吴鼎昌、王永泉来沈阳。我想是因为皖派恐怕此批军火落于直派之手。徐又铮同杨宇霆为士官同学而又是好友，游说我父亲劫留此批军火，并商议扩充军队，此事虽为我父亲势力扩大之根源，亦启奉军入关干政参预内战之开端也。

我对于徐又铮之才气，深为钦佩。我当时虽然是未冠的书生，我的性情，自幼就喜欢观审人物。我脑海中不能忘的是：徐又铮风流潇洒，才气纵横，真够得上“ 上马杀贼，下马露布 ”，我十分钦佩。惜死于非命，丧志而没。否则对于国家必当有更大的作为。

劫械的成功。由第二十七师为基干，又扩编了五个混成旅。以五个混成旅，皆驻于关内。成立了一个奉军总司令部，我父亲亲自兼总司令，徐又铮为副总司令，杨宇霆为参谋长。此奉军二字出现于关内之初始也。

司令部设于天津附近之军粮城。彼时此一实力为皖派一大支柱。后来因徐、杨二人诱杀直派要人陆建章于奉军司令部（ 陆为冯玉祥的舅氏，后来冯亦借此事擅杀徐又铮于廊房车站），我父亲闻而大惊，怒责彼等过于跋扈，再加上其他的摩擦，因而同徐又铮发生龃龉。徐遂辞去奉军副司令之职，杨宇霆因恐惧而未敢返回沈阳。孙赞尧、张叙五相继为奉军副司令。至此时与直派相当的接近。迨至皖直两派战争将起，我父亲曾亲自入京，拟作调人，被段芝泉大为申斥，几至遭祸，遂立返沈阳。未几直皖战起，奉军先是中立，后来援助直军，皖军战败，此乃民国九年之事。彼时我已充任团长，而后有些事情，我已渐渐的参预，以后所写述的，多为我亲身所经历者。

（编著者按）张学良在此段文稿中所谈到的徐又铮，应为北洋军阀徐树铮之误。徐树铮，前清秀才，绰号小诸葛。本系北洋大臣段祺瑞麾下的文案，因为善写文章和出谋献策而颇得段之青睐，后由段祺瑞将徐树铮送往日本，入陆军士官学校。徐树铮毕业回国时，段祺瑞正任江北提督，徐树铮愈得其宠信，段祺瑞任国务总理的时候，徐树铮最得宠时曾出任国务院秘书长要职。

徐树铮对奉系军阀的形成无疑起到一定的历史作用，同时亦如张学良在上述文字中所言，徐氏曾为张学良少年时期崇敬的偶像。然而徐树铮与张作霖合作的始乱终弃，并非如该文所说的主因。张作霖当初借用徐树铮的情报和计谋劫持了冯国璋的军械，张、徐遂成密友。然而张作霖最后驱逐徐树铮的原因，并非仅仅因为徐树铮和杨宇霆在天津谋杀了陆建章，而在于徐树铮在得到张作霖的信任，出任奉军副总司令并在天津代行总司令张作霖职权期间，暗地里与他在日本士官学校的校友、张作霖的总参议杨宇霆在河南私自招募新兵四旅，又图谋在信阳和洛阳等地建立自家势力，张景惠闻知此消息以后，飞驰沈阳密告，张作霖惊悉有变，遂亲往天津向徐树铮问罪摊牌，终于逼迫徐树铮黯然去职。此为历史之真实也，看来即便知情人的记忆有时也难免有别于史实。

张学良文稿中有关徐树铮在天津诛杀陆建章一事，史实记载有别于此文。陆建章尽管素怀野心，但杀害北洋炳威将军陆建章，起因确为陆建章在山东等地勾结土匪、蛊惑军队，而且他在直系中策划主和，反对段祺瑞对南方用兵。徐树铮也没有想到此案会惹起张作霖误会，致使徐张的联合就止分道扬镳。

前文所说的杨宇霆、张叙五（即张景惠）等人皆为奉系军阀旧班底人物。与徐树铮同来东北的吴鼎昌，为四川华阳人，曾任大清银行总务局长、民国初年改任农商部次长，乃为安福系骨干人物。当时与徐树铮来东北协商联合时吴氏乃为北洋政府财政部次长。段芝泉，即段祺瑞。

第一次奉直战争的前因后果

迨直皖战事结束，我父亲到保定同曹锟会见，就起了一场不愉快的事，缘在保定曹之光园开会，商讨善后诸问题，我父亲是不主张对战败者取激烈的报复行动，尤其是对于段芝泉应当与以相当的颜面。（彼时段芝泉仍居北京，并未逃避。）曹仲珊之为人，惟惟诺诺，而吴佩孚在会议席场上，飞扬跋扈，大发激烈言论，主张逮捕段芝泉，严惩某某等等。

我父亲则问曹仲珊：“此位发言者为谁？”曹则愕然答曰：“这是我部下师长吴佩孚，你不认识吗？！”我父亲说：“今日之会，是我等高级层的会商，你未曾告诉我，师长们可以出席，否则我的师长，还有好几个

哪！”曹则令吴佩孚退去。

后来在北京曾开过一个三巡阅使会议，当时我父亲是东三省巡阅使，曹锟是直鲁豫巡阅使，王占元是两湖巡阅使。王占元在直皖之战，取观望的态度，彼时直方有以吴佩孚代王之风传。某一夤夜，在顺承王府我们的家中，曹仲珊同我父亲二人闲谈，彼时我曾侍立在旁。这个时候我家已同曹家联婚，我父亲称曹为三哥。我父亲对曹说：“ 三哥，而后北方局面，我二人可左右之。不可再弄战争，大家好好的练兵，把地方好好的治理，使老百姓过点太平日子。王子春（ 占元） 彼即应邀来京，我们应该以诚相待，使他安心在湖北为对南方的屏障，你切不可轻听部下的怂恿，再拨弄是非。”

曹则微微点头承诺。我父亲则正颜厉色，对曹言曰：“ 三哥你如口是心非，假如你有对王子春不起，你可小心，到那时我可会对你不起，你可不能说我不讲信义。”当时我在旁，听他二人之谈话，我对我父亲的豪爽态度，深为崇敬。

（ 编著者按） 曹仲珊即直系军阀曹锟，天津人。清末为袁世凯麾下第三统制，辛亥革命后始任北洋第三师师长，直隶督军，1922年后为直系军阀首领。1938年病死在天津。王占元则为东北军始创时期张作霖倚重的南方军阀之一。而吴子玉（ 佩孚） 在奉系军阀初创时期，仅仅只是曹锟麾下的中层将官。张作霖的奉系与直系的后起之秀吴佩孚之间在民国史上先后发生的两次大战，就是从保定会议的初次见面拉开序幕的。至于直系军阀曹锟，与张作霖的关系始终是尔虞我诈和明争暗斗。张作霖为拉拢曹氏曾把女儿嫁给曹锟之子，结成了儿女亲家，然而在军事与权力的纷争纠葛中却又不得不以彼此政治利益为重。张学良笔下乃父与曹锟对话的场面，写得真实可信，上述描写非当场亲历者不能诉诸笔端。

张学良在这篇文稿中所说的王子春，即直系军阀王占元。王占元祖籍山东管陶县人，淮军刘铭传的麾下士兵，武昌起义后成为冯国璋部将，历任北洋二师师长、豫南剿匪总司令等职。1919年冯死后王占元改投曹锟，曾任两湖巡阅使。1920年张作霖拟向长江中游扩张东北军的势力，准备以王占元为瓦解直皖两军的内应。因此张作霖才在曹锟面前极为王占春撑腰。不料王占春在第二次奉直战争中与张作霖分道扬镳，而改投曹锟和吴佩孚，1934年在天津作寓公时病殁。

巴黎和会助款成行

第一次欧战停战，开和会于巴黎，中国以参战国身份，派陆徵祥、顾维钧等为代表。但因彼时北京政府经济乏困，无款可拨，代表团不能成行。陆徵祥求助于奉天，我父亲慨然补给十万元，以壮行色，并派王少溥为

其随员。中国代表团在巴黎和会上，因山东问题拒绝签字，在国际上博得声誉，使胶东半岛及胶济铁路，日后得以收回。

（编著者按）这是一段鲜为我知的史实。也是奉系军阀在中国外交上首次参与活动的记录。张学良之所以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抛开浩繁的东北军人事内幕，特别为陆徵祥关东求款写上一笔的原因，说明此事在张学良心中所占据的位置。当时东北军补给10万元，其意义无疑超过金钱的本身。

陆徵祥从晚清时代就是外交官，1919年起出任北洋政府外交总长。由于陆徵祥任内签署了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遂在“五四运动”时遭到免职。1921年他再次出任外交总长，1922年后出任瑞典公使和比利时公使。30年代初期陆徵祥去职后无意回国，即在欧洲各国游历飘泊，受其比利时夫人的影响开始信仰天主教，夫人殁后陆徵祥向本尼迭克修道院申请作终身修道士，皈依天主教期间，罗马教皇授予陆徵祥授比利时圣伯铎禄修道院荣誉院长称号，1949年陆徵祥病死在比利时。

收复外蒙之志未遂

缘外蒙取消独立之后，由褚其祥旅驻防库伦，民国十年，褚军被白俄恩琴所袭溃，白俄军遂占领库伦据有外蒙。而当时之苏俄屡宣言，如中国不将恩琴驱逐，苏俄势将派军征讨。

大总统徐东海征询我父亲意见，我父亲甚为兴奋，愿立功边疆，为国家收复失地，以遏外患。我父亲被任命为蒙疆经略使，组征蒙军。一路由张景惠率领集中于张家口，经滂江向叨林进军。主力则由我父亲自己亲领，集中于海拉尔，然后转向克鲁伦，车臣汗进军。彼时我的第三混成旅先头部队，由郭松龄率领，经铁路输送，已陆续抵达扎赉诺而矣。

正当此时，湖北王占元之第二师发生哗变，直派趁势驱逐王占元以吴佩孚为两湖巡阅使。我父亲闻之大为气忿，怒曹锟趁东北军征蒙外调，而失信排挤王子春，夺取地盘。决心停止征蒙之师，调军回转，向关内集中。以张景惠为西路军指挥奉军第一师、邹芬师、第二混成旅及第九混成旅。我父亲自兼东路军，并分为三个梯队：第一梯队为张作相指挥二十七师、二十八师之一旅及第六混成旅；第二梯队为我指挥第三、第四及第八三个混成旅；第三梯队为李景林指挥第一及第七个混成旅。骑兵司令许兰洲。继为吴佩孚通电反对梁士诒内阁，战事爆发。东北军战败，张景惠被俘，遂退至秦皇岛附近，拒守山海关。仅余我及李景林两部，小加整补，再度在榆关附近激战，大挫直军，最后媾和，退至山海关外。此即称之第一次奉直战争也。

回顾这一段战事，在中国历史上，有重大意义。假如直系不谋夺王占元地盘，而东北军之征蒙事遂，彼时将库伦收回，安有今日之外蒙伪共